

城市群现代化的动力机制与路径

——兼论长三角城市群的区域现代化

孟静 徐琴¹

【摘要】 城市群是现代化的引领区和主要空间载体，对国家现代化具有无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城市群现代化是核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现代化与腹地现代化协同推进的过程，核心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决定了现代化的高度，腹地具有对核心城市溢出要素的强大吸纳力及对整个城市群的支撑力，决定了现代化的可持续性。城市群现代化的主要路径，一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二是建设现代化城市体系、确定城市间新型功能合作关系，并在二者间形成良性循环。就长三角而言，可采取核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大都市区和都市圈-发展主轴-一体化网络的发展模式，一方面提升核心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能级，另一方面发挥腹地优势，培育现代化的紧密跟随者和潜在突破者，形成产业、空间协同度高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和现代化城市体系。

【关键词】 城市群现代化 现代化经济体系 现代化城市体系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382(2021)12-0126-07

从现代化的主体内容看，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带动现代化起步和发展的双翼；从区域发展看，在部分地区率先实现区域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必经环节；从各国现代化实践看，空间上大跨度、功能上高能级的城市群，常常是区域现代化的典型样本，也是国家现代化的火车头和推进器。因此，国家“十四五”规划要求城市群建设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长三角城市群更被赋予了提高“配置全球资源能力”和“辐射带动全国发展”的重任。系统分析城市群发展的动力机制，认识新时代推动城市群现代化的现实路径，并据此推进重点城市群如长三角城市群率先实现区域现代化，对引领、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一、城市群是现代化的主要空间载体

城市群是现代化发展的优势区和引领区。从全面小康到基本实现现代化，既有连续性又意味着发展阶段的全面跃升——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轨、产业链更加紧密、产品的分工更加精细、流动性增强等等，催生着城市间及城市与腹地间更密切、更复杂的联系，使得城市群成为组织和引领发展的新型空间单元和参与全球化的空间主体。

1. 城市群是发展的空间规律与阶段性规律的统一

城市群是大都市连绵区概念(Gottmann, 1957)的中国化发展，是指以超大或特大城市为中心，由若干空间上密切关联的城市及腹地，借助发达的交通与信息网络，发生强烈的相互作用和紧密的经济社会联系，而形成的城市集合体(姚士谋等，2016;方创琳等，2018)。城市群具有以下特征：一是超大规模，集聚了若干高能级城市以及辐射力不同的区域性城市；二是有机性和整体性，城市群内经济、人口等要素流动成本极低，各种要素流的强烈相互作用使得城市间联系空前密切、功能日益互补，相比多个城市的简单集合有着质的飞跃；三是生产力发展的空间体现，城市群的产生不仅是由于疏解“大城市病”而带来的郊区化和卫星城发展，更是由于科技进步使得生产力布局打破了传统区位的局限，变得更自由、更开放，形成新的扩散、集聚与空间组织格

¹**作者简介：**孟静，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徐琴，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南京210004)。

局——一方面面向全球组织生产，使得生产组织的尺度空前扩大，另一方面高新技术产业布局更加重视知识创新、产业配套、人力资源等支撑能力，倾向于向城市群这一优势区域集聚。

可见，城市群既是新型的空间组织形态，以大尺度空间为载体、并不断重塑特定的地域空间；也是生产力发展到新阶段的产物，并随着生产力进步继续发展。它的产生和发展体现了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过程的统一，是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发展成果在空间上的全面投射。据此，可以将城市群的孕育和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向中心城市集聚阶段。工业化初期，具有区位、资源、交通、市场等优势的城市，大规模吸纳要素集聚，由此带动区域的城市化和各级中心城市的形成，并且产生了城市和腹地的发展差异。第二，中心城市辐射扩张阶段。中心城市发展到一定规模后，过度集聚导致成本高企、规模不经济问题，资源、环境容量有限导致一系列“大城市病”，同时生产发展带来的实力提升、经验积累、技术进步等因素也推动社会化再生产的内涵扩大，在市场规律作用下，中心城市的功能辐射和产业转移效应更加突出；周边地区，特别是资源相对丰富、产业配套较好的区域，被纳入中心城市的功能组织和实体运作空间，在政策规划推动下，新城和卫星城得以发展，城市群开始萌芽。第三，多中心合作发展阶段。工业化后期，产业分工向更为精细的部门内产品间分工演变，生产环节专门化与产业链一体化同步推进，使得经济合作的空间范围不断扩大——由中心城市和腹地扩大到中心城市之间，形成了多中心的空间结构，与此相伴城市间的职能结构也发生调整，中心城市作为生产性服务业提供者和创新引领者的功能更加突出，城市群形成并迅速发展。第四，大都市连绵区一体化发展阶段。后工业化时期，知识经济、信息经济迅速发展，与传统要素相比，知识、技术、人力资本的溢出成本更低、流动性更强，知识经济时代的要素流动更加快速，由此带动城市群各成员间更广泛、深入的合作，推动城市群进入一体化发展的高级阶段，现代化经济体系和现代化城市体系逐步确立并互为依托，城市群内逐步实现高水平的均衡发展。

2. 城市群的现代化代表着区域现代化的方向

城市群现代化是区域率先与区域平衡发展的统一。区域率先是现代化的一般规律(胡福明, 2003)。城市群伴随城市化向更高阶段的发展而出现，在形成发展过程中积累了雄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形成了科教创新、体制机制等多方面优势，具备在现代化各领域率先突破的实力，并可以通过知识溢出、产业转移、金融投资等多种渠道，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产生强大的带动作用。城市间联系的不断加强，不仅有利于城市群内部不同规模等级城镇的一体化，而且塑造了城市群的空间大尺度特征，进一步强化了城市群现代化成果沿城市要素流动网络向外辐射扩散的能力。因此，城市群现代化不仅可以对国家现代化发挥引领示范作用，也是国家现代化的主引擎和主要承载空间，是通过率先发展实现协调发展的重要机制。

实践表明，城市群对国家现代化具有强大的引擎和推进作用。在世界普遍认可的六大城市群中：美国东北海岸城市群，以占美国 1.5% 的土地，承载了 1/5 的人口，贡献了 1/4 的 GDP，城镇化率超过 90%，是美国城市发展的先锋，也是全球的经济、金融、传媒、信息和文化中心之一(罗伯特·亚罗和托尼·西斯, 2010)；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是城市群跨国发展的典范，集聚了美国 40% 以上的制造业产值，是北美洲的心脏地带，也是世界先进制造业和科技创新的中心区(国家发改委国土所课题组, 2009；倪鹏飞, 2009)；英国中南部城市群，以英国 1/5 的面积，聚集了 1/2 的人口，是全球出现最早的城市群，也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欧洲西北部城市群，是世界经济增长中心之一，具有典型的多中心结构，其中，巴黎大都市区聚集了法国 1/5 的人口、1/3 的 GDP，莱茵-鲁尔区都市圈是欧洲最大的工业区，兰斯塔德都市圈聚集了荷兰 2/3 的人口、是荷兰发展的中心和重心(李娣, 2015)；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面积约占日本的 1/3，集聚了 3/5 的人口和超过 4/5 的金融、信息、研发、教育机构，是世界六大城市群中空间利用效率和空间集聚度最高的(李荣欣, 2018)。此外，美国西海岸旧金山湾区，GDP 增速连续多年领跑美国各城市群，是科技创新创业支撑城市群发展的典范，2018 年聚集了 33 家世界五百强企业的总部、众多全球顶尖高校和研发机构，以硅谷为代表的信息、计算机、软件等高科技产业引领全球(张振刚和尚希磊, 2020)。

中国的长三角是世界第六大城市群，以占全国 3.7% 的土地，承载了 16.3% 的人口和 24.1% 的 GDP，是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发展协同度最好的区域；2020 年，普通高校数、专利授权量分别占全国的 16.6% 和 31.6%，是中国科教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货物进出口总额、实际利用外资分别占全国的 35.4% 和 57.3%，是中国参与国际竞合的核心区域。中国另外两大发育较成熟的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和粤港澳大湾区，地区生产总值分别占全国的 8.5% 和 11.4%。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城市群

合计占中国 GDP 总量的 44%, 可见, 城市群同样是中国当前最重要的空间组织形式, 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和现代化的引擎区。

二、城市群现代化是中心城市现代化与腹地现代化协同推进的过程

1. 中心城市决定了城市群现代化的高度和全球竞争力

城市群中心城市是一国乃至全球的政治、经济、金融、商贸、创新中心, 其发展水平决定了城市群乃至国家现代化的高度及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能力。全球化、知识化、信息化又进一步推动城市群中心城市的地位日益提升。一方面, 全球性流动使中心城市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通过跨国公司全球布局、各种商务合作等形成全球城市网络, 成为全球经济的组织中心; 另一方面, 区域内城市间连通性的增强, 使得中心城市吸引人才、资金等方面的优势充分发挥, 高端服务业得以在中心城市集聚, 可以为全国乃至全球提供人才培养、创新培育和金融投资等高端专业化服务。拉夫堡团队借助跨国公司总部和分部的区位数据, 对世界城市进行研究, 评选出的 10 个首位世界城市中, 第一序列的全部城市——伦敦、巴黎、纽约、东京, 及第二序列中的芝加哥、香港、洛杉矶, 均是世界主要大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彼得·霍尔和凯西·佩恩, 2010)。

城市群中心城市是国家的经济组织中心。其不仅经济实力雄厚, 而且是跨国公司总部、跨国银行总部或分支机构的所在地, 是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区。如, 城市群中心城市伦敦、纽约、东京、香港均是全球性金融中心; 长三角中心城市上海 GDP 占全国的 3.8%, 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全国的 2.24 倍, 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为 73.1%, 是中国综合能级最高的城市; 京津冀中心城市北京 GDP 占全国的 3.6%, 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全国的 2.16 倍, 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为 83.8%。这决定了城市群中心城市可以通过专业化服务系统、金融投资系统、贸易流通系统等, 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调配资源, 对国家乃至全球的经济体系发挥组织作用, 引领经济现代化进程。

城市群中心城市是科技创新、理念创新、政策创新的策源地。信息化时代流动性不断增强, 使创新模式由封闭走向开放, 中心城市可以把不同职能的城镇及企业、投资者、消费者等相关主体汇集在同一网络中, 为创新提供人才支持、金融支撑和应用市场, 从而极大优化创新资源的组合、有效提高创新效率, 有助于创新的产生和推广, 可以发挥高价值的知识溢出效应, 为国家现代化提供创新支撑。如, 美国东北海岸城市群中心城市之一波士顿, 是世界教育和高科技产业中心, 在科技创新方面发挥了导向作用; 欧洲西北部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巴黎被称为“现代性之都”(大卫·哈维, 2010)、“时尚之都”, 在文化艺术创新方面发挥了导向作用。中国长三角中心城市上海, 2020 年 R&D 经费支出、发明专利授权量分别占全国的 6.6% 和 4.6%, 对中国的科技创新、文化创意、制度创新发挥着强大的导向作用。

城市群中心城市是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枢纽。城市群中心城市往往也是高水平的国际化城市, 甚至是全球城市, 相互之间的竞合互动频繁而强烈, 通过跨国公司、科技交流、人才交流、商务商贸合作等组成紧密的国际化城市网络, 从而成为国家开放合作的门户和沟通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的枢纽。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 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征程; 长三角中心城市上海的浦东新区开发开放, 将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向新高度。2020 年, 上海货物进出口总额、实际利用外资分别占全国的 10.8% 和 14%, 深圳货物进出口总额、实际利用外资分别占全国的 9.5% 和 6%, 对外开放枢纽作用至关重要。

2. 腹地现代化决定着城市群现代化的可持续性

城市群能取代单个城市成为参与国际竞合的主体, 核心城市要成长为国际化大都市甚至全球城市, 均离不开腹地的支撑。某种意义上, 腹地的发展水平决定了城市群的综合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世界六大城市群均有广阔且发达的腹地, 集聚了众多不同规模的城市: 美国东北海岸城市群集聚了纽约、波士顿、华盛顿、费城、巴尔的摩等 5 个核心或区域中心城市, 及 40 多个卫星城镇; 欧洲西北部城市群人口超过 10 万的城市有 40 多座; 中国的长三角城市群也是中国城市化水平最高、城镇最密集的区域, 发达的县域经济更是长三角城市群的突出优势, 2021 年中国百强县长三角占 45 席, 其中前 50 名长三角占 31 席。

腹地现代化是实现增长、容纳增长、支撑增长的必要路径，也是城市群现代化的必然阶段。现代化是从非均衡向均衡发展的过程，中心城市从单向集聚转为强大溢出效应与集聚并行，其集聚功能转向对创新、人才、企业总部等高端要素的集聚，这些要素功能的发挥，需要更广阔的区域作为创新孵化地、产业配套地，只有在腹地具有较强的综合实力和产业配套能力时，中心城市的孵化器功能才能充分发挥。而且进一步通过中心城市与腹地间的知识溢出、技术转移、要素流动、城际贸易等，强化多向联系与互动，产生共同发展的合力，带动城市群产业链、价值链不断攀升，使城市群获得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现代化需要在大尺度空间内组织经济活动和城市功能。城市群内不同规模城市间存在功能差异和相互依赖，共同组成联系紧密、规模庞大、结构复杂的网络。单体城市的国际竞争力往往有限，但通过城市群内的产业调整与协作，可以在总体上形成类型多样、业态多元的产业群落，不仅可以增加产业黏性、区域发展韧性和国际影响力，而且可以对冲发展的不确定性、拓宽发展空间、增加发展机会，使发展变得更可持续。因此，中心城市与腹地共同构成的城市群系统的能级，决定着城市群的影响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现代化经济体系和现代化城市体系是城市群现代化的双重维度

1. 经济动力升级是城市群现代化的关键支撑力量

城市群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杨智雄和翟磊, 2020)。在此阶段国家或区域的工业化、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发育等均具备良好基础，要素升级和动力升级成为城市群实现发展阶段升级、继续发挥引领作用的必然和必需路径——经济动力升级直接决定着产业发展效率、国际竞争力、区域影响力，成为城市群现代化的关键支撑力量。无论国家还是区域，只有把握住不同阶段的经济发展动力，才能有效促进持续增长。凯恩斯的需求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是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新近研究多认为经济增长动力的要素更广泛，包括承载空间、资本、生产者等生产要素，科技创新、经济结构、政治体制和产权机制等结构因素，并且认为经济增长具备阶段性特征，不同阶段的驱动力也不相同。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特别是 1992 年国家明确要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长三角城市群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国家在战略层面明确了长三角的示范和带动功能，为三省一市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动力。2020 年，长三角城市群 GDP 总量达到 24.47 万亿元，占全国 GDP 总量的百分比较 1992 年提高了 3.7 个百分点。1992-2020 年间，长三角城市群 GDP 复合增长率为 14.55%，显著高于全国复合增长率 13.77%。

2. 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要求和主要内容

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推动城市群现代化的核心动力，城市群的现代化首先要建设现代化的经济体系。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寻求新的发展动力，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为此，城市群必须率先加快建设新时期现代化经济体系，引领国民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落实新发展理念。第一，以创新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城市群的经济体系现代化，重点在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特别是在“卡脖子”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增加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第二，以协调发展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无论是长三角城市群还是中国其他地区，区域不平衡、城乡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平衡等问题都依然存在，在发展潜力、动力转换、制度创新等领域也仍面临深入深化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造成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之间的循环不畅。必须注重各类资源均衡、恰当配置，补齐发展的短板，深挖发展潜力，提高发展的整体性和协调性，以确保发展的可持续性。第三，以绿色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主题，适当淡化经济增长速度、规模等传统数量指标要求，兼顾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刘志彪, 2018)。第四，以开放发展解决发展的内外联动问题。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更高水平的开放型、包容型经济体系，要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继续坚定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不动摇。第五，通过共享发展确保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不断缩小贫富差距，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畅通阶层间流动，实现发展的公平性。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加快建立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必须把重点放在巩固和提升实体经济方面，加快发展、持续夯实实体经济，而科技创新、现代服务业体系和相匹配的人力资源，则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只有现代产业体系不断完善，才能促进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由大变强，使经济发展动力摆脱主要依赖低成本要素投入的粗放型发展路线，大幅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使经济发展向质量提升转变。一要构建现代化的工业体系，避免“脱实向虚”的不良倾向。特别是在核心关键技术受制于国外的行业和领域，针对痛点加大研发投入、加快技术创新，通过城市群的产业升级，促进和带动我国制造业进入全球工业价值链的中高端；同时继续深化供给侧改革，果断减少无效供给和缺乏竞争力的低端供给，从整体上提高供给产品的质量，推动工业向高质量的方向发展。二要提升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质量，以生产性服务业形成对制造业发展的强劲支撑，以制造业形成对服务业发展强大的需求动力，促成产业间的协同融合发展。

3. 现代化城市体系的建设要求和主要内容

作为托起现代化的双翼，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协同推进是现代化的基本内容。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立和运转，必须与现代化城市体系的建立和运转互为支撑。现代化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也是对地理空间的重新规划和建设。一方面，现代化进程必然以现代化的空间为载体，现代化城市体系是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历史进程在地理空间上的呈现，是诸多现代化驱动力的集中和最具代表性的体现；另一方面，空间自身具备塑造各种社会经济活动的的能力，现代化城市体系会极大影响甚至决定流动方式、生产效率、人才结构、文化理念等，从而影响现代化进程的诸多方面，是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对于城市群而言，更需要通过现代化城市体系的构筑，助力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构建。

建设现代化城市体系要实现发展理念、建设导向和管理范式的全面现代化。首先要满足经典现代化的基础性要求，实现工业文明的全面覆盖。这不仅仅指经济的工业化，而是指工业大生产中所培育的计划性、合作、时间、科学、规则等理念在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渗透。城市治理上要在法治化前提下践行民主决策机制；社会人文方面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社会福利；价值观方面要倡导科学、合作、可持续等理性思维。为此，构筑现代化城市体系显得日益迫切。城市，作为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策源地和交流枢纽，不断催生和发展着更先进的生产力和更繁荣的市场，发挥着辐射带动整个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作用，成为现代化的导引和中心，往往可以促使一些领域获得突破性进展，进而加快进入现代化前沿的节奏。其后，在满足经典现代化要求的基础上，现代化城市体系建设应主动催生和吸收最先进的现代化理念和发展观(黄乃文，2001)，主动探索向知识时代转型，实现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当前的现代化理论秉承的是以人为本、以满足人的物质和精神文明需求为目标的发展观，重视人文社会全面发展。现代化城市体系的建设同样必须突出人的核心地位，按照可持续发展原则，在基础设施建设、人文居住环境、市民生活质量和文化素养方面，均要体现人同时作为当代文明核心的主体和客体的地位，探索出既能满足当代人生存发展权力又能保障子孙后代持续发展能力的路径。

现代化城市体系要求城市间具备新型的功能关系。第一，不同规模、等级和功能的城市间联系日益增强，空间更具流动性。这种联系以发达的交通、信息等基础设施网络为基础，以一体化的市场体系、政策环境等为保障，以企业和产业间合作为主体、以城市政府间合作为推动，城市体系内任何一个城市发展所依托的资源要素和影响力均已远远超出其行政边界，城市间相互联系为一个有机整体，共同发挥作用。第二，城市间的产业分工更加深化、细化，由此形成的产业配套能力成为城市群的核心吸引力之一，合作共赢取代对资源市场的争夺成为城市间的主导关系。现代化产业具有更高的外向型，高科技产品的生产涉及研发设计、生产设备、原料辅料、加工检测等众多环节，每个环节又有众多工序，是个海量规模的产业链，必须依托整个城市群提供配套。城市分工由产业间分工转变为产品间分工和生产工序分工，形成了具备自我完善、自我更新活力的产业集群。第三，城市间的关系是平等的。由不同规模、功能的城市组成的城市体系具有层级特征，存在中心-次级中心-区域中心-腹地的差异化分工，中心城市更多地发挥着科技、创新、信息、金融中心等职能。但不同能级的城市间并不存在行政依附关系，而是互有需求互相支撑的合作伙伴关系，每一个城市都既存在于城市群网络中又保持对外的开放性，具有实现跨越式发展和层级跃迁甚至成为新阶段的引领者和新中心的可能性，而不是“锁死”在现有的城市能级体系中。

四、对长三角城市群现代化的启示

长三角作为中国发育最成熟的城市群之一和世界第六大城市群，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引领区和我国跨省域协调发展的先行先试区。按照城市群现代化的基本逻辑，当下长三角城市群现代化的重点，同样在于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和现代化城市体系，并以此协同推进中心城市和广大腹地的现代化。

1. 率先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

长三角城市群要主动担当起在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走在前列、争当表率、争做示范的历史使命。第一，在创新发展上走在前列。坚持创新是第一动力，集中力量进行核心技术攻关、积极培育战略科技力量、大力促进科研成果产业化，并且同步推进适应新发展需要的体制机制创新，深化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以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形成以创新为核心的参与国际竞争的系列优势。第二，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上走在前列。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技术自立自强为关键，全面推动供给结构、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升级，使长三角成为国内大循环的发起点和关键支撑；以国内大循环带动国际大循环提档升级，实现与全球创新链、人才链、价值链的多触点式互联互通，使长三角成为中国融入国际大循环的重要通道和支点。第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走在前列。三省一市要以高质量发展为引领，做好高位统筹，构建激励创新、改革赋能、包容审慎的体制机制，全面推进“六个现代化”，建设现代化经济新高地、民主法治示范区、文化发展领航区、社会发展先导区、生态安全模范区、民生幸福新标杆。县市层面，要坚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在“六个现代化”中各有侧重，在没有先例的领域率先探索出成功案例，以某些城市、某些领域的率先突破，推动区域整体现代化，最终形成具有强大能力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新格局：核心城市上海形成服务整个长三角甚至全国的综合服务能力和辐射带动能力；南京、杭州两大副中心及合肥等区域性中心城市，大力发展各类实体性创新产业与产业链，积极提升生产性服务业水平；江苏坚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浙江做强做优数字经济和现代商贸，安徽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

2. 积极构筑现代化城市体系，形成多层次、多中心共同引领的架构

城市体系现代化，是城市群现代化的具体综合体现和主要空间载体，一方面以经济动力的升级为驱动力，另一方面又对经济动力升级形成强大的反作用力。

长三角城市群的城市体系演变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点。第一阶段，改革开放初期，以苏南为代表的乡镇集体经济得到快速发展，通过吸纳外来劳动力，直接促进人口向苏锡常地区流动。第二阶段，随着上海浦东的开放开发，上海的人口集聚力和产业集聚力迅速提升，并由此形成强大的溢出效应，直接带动了苏南地区的外向型经济，与此同时浙江民营企业充分发展，人口迅速大规模地向苏锡常地区和杭州湾地区集聚。第三阶段，城市群的城市化在全国率先达到高水平，城市化进程保持平稳、质量不断提升，区域内城市层级分异较明显。上海是人口的密集集聚区，在区域内城市化水平最高；南京都市圈、杭州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等相对成熟的都市圈及合肥、嘉兴、宁波、温州等城市次之；而皖西、皖北、苏北等区域内的城市吸引力相对较小，属于弱人口集聚地或者人口流出地，产业发展的空间资源更为丰富，也成为具有后发优势和较大发展潜力的区域。

目前，长三角正在进入现代化城市体系建设阶段，可采取核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大都市区和都市圈-发展主轴-一体化网络的发展模式，上海大都市区、南京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合肥都市圈、宁波都市圈、温州都市圈采取单中心发展模式，苏锡常都市圈、徐连盐都市圈、金义都市圈采取多中心协同发展模式，通过都市圈发展做强圈层，对周边形成强大辐射带动能力，成为城市群发展的核心中枢；以城市群内发达的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网为骨架，促进各种要素沿网络自由流动，形成沿江、沿东陇海线、沿海、沿运河发展主轴；在要素流动基础上各区域、各城市、各都市圈内形成良性互动、协同发展，最终形成城市群发展的网络状格局。

作为超大城市的上海，只有以共享发展机遇、共担发展责任的原则为指导，才能顺利实现大都市区的功能分解和区域内的协同配合。上海大都市区应当具备多重全球示范性功能，尤其是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不仅需要从空间维度以更开放的心态动态筹划上海大都市区的空间范围，而且需要从功能维度重点巩固上海大都市区及长三角城市群体系内部的一体化发展格局，使得

城市间的功能协同显著提升。

杭州都市圈和南京都市圈是长三角的两大副中心。杭州都市圈作为全国省会都市圈中经济总量较大、城市高度集中、城镇协同度高的成熟型都市圈，要发挥第三产业发达的鲜明优势，尤其是以数字经济这一强项为抓手，整体抱团参与长三角一体化，支撑起长三角南翼；发挥经济中心作用的同时，要加强省会城市政治和文化中心作用的发挥，全方位提高其在浙江乃至更大区域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南京都市圈首要的任务是提升中心城市南京的辐射能力，着力培育在全国乃至全球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产业创新集聚区、构建长江中下游重要的资源配置中心、打造在全国范围内同城化发展的样板和高品质健康宜居生活圈，以此支撑起长三角西翼。南京要提升现代服务质量、增强辐射带动功能，需要扩大增长点的范围，将镇江、扬州纳入紧密协作区，马鞍山、滁州、芜湖、淮安、宣城等纳入主要辐射区和产业互补区，共同形成增长极区域(张颢瀚和孟静，2007)。

与南京、杭州相比，合肥都市圈经济体量较小，合肥这一中心城市和周边城市的经济发展融合不足，但发展后劲较大。合肥作为中国重要的科技创新中心和科教文化基地的定位，有利于合肥都市圈承接长三角的科技创新、产业转移，发挥更大的协同效应。要加强合肥都市圈现有成员之间的经济联系，将圈内的力量发挥到最大，创新和强化合肥都市圈发展和圈内一体化的政策措施，扩大区域合作的范围，把产业合作、经济融合作为主攻方向，形成都市圈内各地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特色鲜明的产业布局。

3. 发挥腹地发展优势，培育现代化的紧密跟随者和潜在突破者

长三角的广阔腹地是支撑长三角城市群建设的重要优势条件，土地资源、产业基础、人力资源使其有较强的产业配套能力、空间承载能力和人力资本优势。江苏北部、浙江西部和南部以及安徽大部作为长三角广阔的发展腹地，为长三角提供了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条件。

一方面，以区域空间的优化为落脚点，促进中心城市和腹地一体化深化发展。加速构建“轨道上的长三角”和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完善中心城市和腹地之间的交通基础设施的无缝一体衔接，促进要素在更大范围内高效流动和利用。加快落实教育、医疗、文化等资源的跨区域共享机制，通过打造基于充分竞争的区域市场和因势利导、边界合理的有为政府，以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来决策腹地区域内的技术和产业布局，与中心城市形成互补的格局。

另一方面，紧扣一体化的命脉，以异地一体的思路推出创新措施，突破行政壁垒、推进政策协同，发挥长三角区域内各地的比较优势，实现更合理的功能整合，并在立足长三角的基础上跳出长三角，在国家级发展轴中承担起重要节点甚至是区域性中心作用。对位于长三角腹地的中小城市而言，当前发展的关键是要突破创新资源“虹吸”和“被虹吸”的尴尬局面，这就要求腹地城市顺应创新资源梯度转移的客观规律，力求创新资源“不为所有，但为所用”。为此，不同层级的城市要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研发中心可以设在城市群中心城市，在产业链中下游地区建设飞地用于创新成果产业化，推进长三角区域内创新资源的合理布局。

参考文献:

[1].Gottmann,J.Megalopolis:or the Urbanization of the Northeastern Seaboard.Economic Geography,1957,33:189-200.

[2].[英]彼得·霍尔、凯西·佩恩编著，罗震东，等译：《多中心大都市——来自欧洲巨型城市区域的经验》，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年版。

[3].[美]大卫·哈维著，黄煜文译：《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
- [4]. [美]罗伯特·亚罗、托尼·西斯著，蔡瀛、徐永健译：《危机挑战区域发展》，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
- [5]. 方创琳、王振波、马海涛：《中国城市群形成发育规律的理论认知与地理学贡献》，《地理学报》2018 年第 4 期。
- [6]. 国家发改委国地所课题组：《我国城市群的发展阶段与十大城市群的功能定位》，《改革》2009 年第 9 期。
- [7]. 胡福明：《中国沿海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实践与思考》，《江海学刊》2003 年第 1 期。
- [8]. 黄乃文：《城市现代化：基本内涵与指标体系》，《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1 年第 4 期。
- [9]. 李娣：《欧洲西北部城市群发展经验与启示》，《全球化》2015 年第 10 期。
- [10]. 李荣欣：《日本东海道城市群建设启示录》，《前线》2018 年第 4 期。
- [11]. 刘志彪：《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基本框架、关键问题与理论创新》，《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8 年第 3 期。
- [12]. 倪鹏飞：《这些腹地曾经或正在创造辉煌》，《经济日报》2009 年 4 月 9 日第 11 版。
- [13]. 杨智雄、翟磊：《当前中国城市群发展水平差异评估——基于七个国家级城市群地级及以上城市 2018 年数据的测算》，《管理现代化》2020 年第 3 期。
- [14]. 姚士谋、周春山等著：《中国城市群新论》，科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 [15]. 张颢瀚、孟静：《长三角都市圈发展新格局——南京都市圈功能变化与空间整合》，《南京社会科学》2007 年第 9 期。
- [16]. 张振刚、尚希磊：《旧金山湾区创新生态系统构建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启示》，《科技管理研究》2020 年第 5 期。